

社会网络与山区少数民族 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

□ 郭云涛

〔摘 要〕 通过对广西南部壮、瑶两个族群的比较,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非农职业流动的负面影响。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原初社会网络”呈现民族构成单一、职业构成同质性高、以强关系为主等基本特征。这使得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难以融入打工地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新社会网络”难以建构,对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

〔关键词〕 社会网络;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06-08

On Social Network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the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from Mountainous Areas

GUO Yun-tao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two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ern Guangxi,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among the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from mountainous areas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ir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fieldwork data shows that the primary social network is featured by monotonous ethnic composition, high degree of homogeneity in occupations, and strong ties between individuals.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from mountainous areas to be accepted by the local social networks and to build new social networks in the working place. This will consequently cas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the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from mountainous areas and will aggravate their poverty statu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s; migrant workers; the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外出务工等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P3)}这意味着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非农职业流动机会对于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较低的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如果能够充分把握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非农职业流动机会,通过加强外出务工等非农经营方式增加家庭收入,则可以摆脱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增加家庭收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如果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那么,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对市场利用的机会究

* 基金项目:“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特聘专家岗项目资助。

竟如何呢?

笔者对广西南部两个少数民族行政村进行田野调查。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我们所调查的两个少数民族行政村中,壮族所在的S行政村包含相邻的两个同姓氏村屯,处于广西南部土地相对肥沃的丘陵地区。从本次调查的家户收入来看,地处丘陵地区的壮族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较为多元化,不仅能够在水田中种植双季稻、在旱地种植玉米、黑山羊、猪、鹅等家畜、家禽养殖业也较为发达。30户受访家庭平均农业经营年纯收入约为五千元。

S村壮族农民家庭非农业经营性收入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该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分布较为分散,在矿山工程、灯饰生产销售、陶瓷加工销售、服装加工、武装押运、运输公司等多个非农职业领域呈现小规模聚集形态。从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等级来看,虽然主要以普工为主,但其中有1位私营企业主,4位包工头,1位厂长和1位部门经理,1位报关员和1位牛仔裤染色技术员。30户受访家庭平均外出务工年均纯收入约为1.2万元。^①

而C村瑶族所居住的行政村处于广西南部石漠化较严重的山区,为地理上相邻近、相互通婚的4个小寨子构成。4个寨子离行政村所在地就有15公里左右,交通极其闭塞,简易公路才刚刚修通。受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村民只能见缝插针似地种植玉米,通过编制较为简陋的竹木器具出售以补贴家用。调查发现,把玉米等农产品折合成货币,30户受访家庭平均农业经营年均纯收入约为一千五百元左右。

非农经营性收入也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收入。从C村瑶族农民工非农职业的分布来看,30位受访者中,15人在广西南部的国有林场伐木,其中有两三位包工头;其余零零散散地分布在电子厂、五金加工、腻子粉加工等职业中。在伐木行业,一年只能工作六七个月,月平均收入在一千一百元左右;电子厂普通工人月均收入九百五十元左右,熟练工人月均收入一千一百元左右;而在其他行业,月均收入则只有九百元左右。30户受访家庭的外出务工年均纯收入约为七千元左右。

可见,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方面,丘陵地区的S村壮族要高于山区的C村瑶族。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可以解释这两个少数民族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方面的收入差距。在非农职业领域,与C村瑶族相比,S村壮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种类较多,非农职业收入也更高。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S村壮族农民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要高于C村瑶族。对此,两个村落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总之,对两个地理位置不同的行政村调查表明,

地处山区的C村瑶族农民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职业收入方面都低于地处丘陵地区的S村壮族村民。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地处C村山区的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地处山区的C村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呢?

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因素是导致山区C村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是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那么,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非农职业流动进行过哪些研究呢?

二、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劳工移民群体的一种类别。国外对劳工移民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劳工移民过程中,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迁移、流动过程中的流动目的地选择、求职、社会适应、升迁等各个环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3](P73~82)}在劳工移民群体内部,不同种族(民族)劳工移民的社会网络特征间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网络对不同种族(民族)成员职业流动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黑人等有色种族劳工移民群体中,社会网络的种族(民族)构成、职业构成同质性较高,社会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有限,存在着明显的“天花板”效应。^{[4](P175)}

在中国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研究领域,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是其重要研究议题之一。^{[5](P1~10)}研究表明,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的每一环节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但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从非农职业流动过程来看,社会网络可以划分为流动前在家乡建构的“原初社会网络”以及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建构的“新社会网络”。研究表明,农民工初次流动主要依赖“原初社会网络”,而在后续的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6](P91)}

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着性别、民族、区域、收入、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是个分化的异质性群体。在社

^① 在2009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农民工返乡回流。因此,在2009年4月至5月间,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同仁组织8位硕士研究生到广西N市M县两个行政村的5个少数民族屯寨进行田野调查。我们不仅到市、县两级的农业部门收集资料,也搜集了各个行政村、屯寨的基本资料,对5个屯寨中55位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

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研究中,研究者们认识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群体中对社会流动的不同影响,却很少研究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不同民族族群中对社会流动的不同影响。^{[7](P65)[8][9]}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分析过在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对非农职业可能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10]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看,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卷化”有可能会对族群成员社会网络特征产生影响,从而有可能影响族群成员的社会资本动员和非农职业流动,但该研究并没有拓展这一议题。因此,该研究虽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但却没有沿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视角加以深化和拓展。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性别、阶层差异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有研究认识到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问题,但却很少有学者系统地分析过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民族差异及其对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等问题。

而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却表明,山区与丘陵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之间不仅在社会网络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会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山区与丘陵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间的社会网络存在哪些差异?社会网络特征的这些差异是如何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呢?笔者将通过丘陵地区S村壮族农民工和C村山区瑶族农民工社会网络特征的对比来揭示不同区域族群的社会网络间存在的差异,并归纳其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的负面影响机制。

三、S村壮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职业流动

传统农村社会被称为“熟人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在村落等“熟人社会”共同体中,村民间守望相助,彼此熟悉、信任。^{[11](P10)}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在传统的村落“熟人社会”中,同村关系是一种“强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村落集体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汉族村落转变为一个“弱熟人社会”,^[12]即同一村落内村民依据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化为多个跨村庄、小规模、人际关系稠密的“小亲族”,^[13]同村关系反而逐渐淡化,转变为一种“弱关系”。

对丘陵地区S村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壮族农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民族身份、同村关系都被淡化。例如,在通婚过程中,没有“男不外娶,女不外

嫁”的传统,族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这说明,地处丘陵地区的S村壮族农民的民族身份内容被淡化,社会内同并没有呈现“内卷化”特征。和汉族村落一样,在S村壮族,同族、同村身份仅是一种“弱关系”,村落中的村民也依据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化为数个跨民族、跨村庄、人际关系稠密的“小亲族”。

1. “小亲族”与流动路径的多元性

S村壮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并没有呈现“内卷化”特征,因此,族群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开放。集体社会网络的开放使得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构成异质性较高,不仅有“小亲族”成员的“强关系”,也有同村、同族身份等“弱关系”,因此,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关系构成较为多元。社会网络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族群成员社会网络关系构成的多元性有利于成员获得非农职业信息。例如,在非农初职的流动时机上,有的S村村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通过各种族际社会关系网络得知了外出打工的信息。在访谈对象中,SFH02年龄最大,今年51岁。他很早就听一个汉族朋友说在广西的大明山、平南等地方打工能赚钱。因此,在1979年,他19岁时,就出去打工了。他说:

“和朋友在大明山、平南等地的石矿负责打钻。工作的地方并非正式的矿场,而是私营老板承包的。每天晚上进山,工作很累,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手、眼、脑并用,每个月工作二十多天(看天气情况),每年工作9个月(农忙或其他原因)。收入比在家务工高很多。后来,我两个弟弟就和我一起出去。我小弟还自己组织了一帮人,成为小包工头。”(访谈资料1:SFH02,男,51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4月30日,地点:S村其家中大厅。)

在壮族,以他们兄弟仨人作为中心,联合邻里、亲戚和朋友等“小亲族”成员,组成一个工程队,专门从事有关打洞、开采矿山等非农职业。村民SFH09在广东中山市的某灯饰厂任厂长。在谈及流动经历时,他说: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跟随外地亲戚去广东中山市某灯饰厂打工。从普工做起,一步一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老板的赏识、兄弟朋友的帮忙,我从主管、车间主任、经理助理到经理、厂长。现在,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我厂里做事。”(访谈资料2:SFH09,男,32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5月2日,地点:S村其妻子开设的小网吧。)

以这位厂长为中心,他的亲戚、朋友等组成的“小亲族”主要以灯饰的生产、经销为职业,组成了另外一个就业路径。壮族还有一些“小亲族”从事瓷器加工、销售等业务;有的从事煤炭运输、销售;还有的

组成车队,经营运输公司;有的组成押运公司。总之,从调查的资料看,在S村壮族,族群成员的流动往往以“小亲族”为中心,从事不同的非农职业,流动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

可见,在S村壮族,族群分化为不同的、与其他族群联系密切的“小亲族”。这些“小亲族”使得壮族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族群成员流动路径的多元化使得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构成、职业构成异质性更高,有利于同村村民的转职等职业流动。在访谈中,这种案例较多,如以下2例:

“我开始是跟着我姨夫在县城学开车,帮助他押车。后面觉得开长途货运车比较危险,也很无聊,收入也不高。我就出去打工。到广东中山后,我联系了我们屯里灯饰厂的那个厂长,他答应了,叫我去他那里工作。一天工作8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12点,再从下午1点到5点,如果订单多的话就加班。工资1200左右,从不会有克扣工资的现象。”(访谈资料3:SFH07,男,21岁,初中未毕业。时间:2009年5月2日,地点:S村小商店门口。)

“我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刚开始时,年纪较小,家里也不太缺钱,出去只是为了好玩。一开始和老乡到广东鞋厂打工,工资计件,一个月有1500元左右,都花光了。后来年纪大点,想学点技术。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安排到了数控操作的岗位。这个岗位有专门的师傅指导。很快就学会了数控操作,比那些技校出身的中专生技术还好。”(访谈资料4:SFH11,男,23岁,初中未毕业。时间:2009年5月2日,地点:S村其家中大厅。)

壮族农民工的转职往往较为频繁,但通过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人情、影响力和信息等社会资源的支持,转职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业。因此,在一个相对分化的少数民族中,众多与其他族群联系密切、非农职业较为多元的“小亲族”有利于族群成员扩展非农职业流动路径,从而使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职业构成异质性更高。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使社会网络中蕴含更为丰富的信息、影响力等社会资源,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动员有利于族群成员的转职等职业流动。

2.“新社会网络”的建构与非农职业流动

在S村壮族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形成族群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因此,虽然他们属于少数民族,但民族身份社会认同的弱化有利于他们融入打工目的地的地方性社会关系,从而建构“新社会网络”。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民非农初职流动过程中,无论是在流动目的地、职业的选择和职业机会的获得等方面都主要依赖于其“初始社会网络”,但在其后的非农职业流动生涯过程中,其非农职业成就则取决于在

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和网络资源的动员能力。本研究的田野调查资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所访谈的30位壮族流动农民工中,有6位壮族农民工成功的建构了“新社会网络”,其非农职业成就也较高。兹举几例:

某男,今年34岁,1989年初中没毕业就跟表哥一起到海南烧砖、打沙,以后到深圳搞建筑、拉石头,基本上什么活都干过。离开深圳后到广州做帽子、做衣服,那时底薪700元/月,包吃住,一天7元生活费。2002年开始在广州做牛仔裤,一个月3000~4000元,是洗衣方面的技工。这个工作是以前在总厂做电工时认识的一个主管给找的,因为和这个主管关系好,后来主管被调到分厂当厂长时他就把我给带过去了,这个部门工资高,很难进去。(访谈资料5:SFH04,男,34岁,初中未毕业。时间:2009年5月1日,地点:S村其家院子中。)

某女,今年28岁,在东莞一家香港人办的电子厂上班,现在的职位是通关员,即检查出厂的货物的数量和类型,列出清单,月收入2800元左右。她的人际交往比较广,有很多东莞本地的朋友,而且自己已经很适应城市的生活,现在是请假回来的,自己返乡了还有点不适应。(访谈资料6:SFH19,女,28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5月4日,地点:S村其家二楼客厅。)

某男,今年32岁,1993年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从事灯具行业。当时的厂规模就只有几十人,以前是内销,转变到现在为外销型,当时作为普通员工一个月也只有七百多元。经从底层工作,一天十个小时,经常加班,没有周末休息时间。个人的工作业绩使他在1999年开始担任主管。担任主管后,经常和厂领导打交道,在广东中山那边认识很多当地的朋友,应酬较多,不久就顺利升为厂长,基本工资3000,有提成,月收入大约在6000元。现在回家后仍然和那些朋友有联系,准备利用经验和人脉在南宁开个灯饰店。(访谈资料7:SFH09,男,32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5月2日,地点:S村其妻开设的小网吧。)

上述3位受访者在农民工群体中,在职业收入或职业声望方面,都处于较优秀的行列。他们的非农职业生涯之所以较为成功,除了在工作中勤勤恳恳,积累了一定的业绩和能力,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融入了由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员构成的“次级群体”社会关系网,并重新建构“新社会网络”。通过重构的社会关系和动员关系中嵌入的社会资源,他们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职业或收入。

S村壮族的案例表明,在一个相对分化的少数

民族中,众多的“小亲族”有利于族群成员扩展非农职业流动路径,从而使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职业构成异质性更高。个体网络的异质性使社会网络中蕴含更为丰富的信息、影响力等社会资源,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动员有利于族群成员的转职等职业流动。另外,族群社会网络的开放性、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和族际交往经验使S村壮族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更容易融入地方性社会关系,建构“新社会网络”的能力更强。那些网络重构能力较强,通过重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动员,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职业或收入。

四、C村山区瑶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职业流动

地处丘陵地区的S村壮族农民在与其他民族长期互动、交往过程中,社会认同逐步弱化。与之不同的是,C村山区瑶族农民依然较为封闭。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对C村山区瑶族族群成员“乡土社会网络”“新社会网络”特征的建构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了族群成员的非农职业流动。

1. “乡土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初职流动

对比丘陵地区的S村壮族,C村山区瑶族农民的“乡土社会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族内交往密切,族群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封闭。与我们所调查的丘陵地区S村壮族村屯相比,居住在C村山区的瑶族村寨农民同族群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但族际之间的交往则相对较少,因此,由族群关系建构的社会网络相对较为封闭。这一点,从其婚姻网络中就可以发现。我们所考察的3个C村山区瑶族村屯中,村民依然保持着“男不外娶,女不外嫁”的婚嫁传统。在我们所访谈的25名瑶族村民中,有13名已婚,其对象都是瑶族。瑶族内部通婚使姻亲关系和同族关系交织在一起,有利于加强族群内部成员间的交往,使族群内部更为团结,但却丧失了族际交往最重要的桥梁,使C村山区瑶族族群社会网络呈现封闭特征。

其次,成员的族外交往较少,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构成同质性过高,只有同族内的“强关系”,跨族群的“弱关系”较少。封闭的族群社会网络使得C村山区瑶族屯寨的村民对族群之外的人显得有些冷漠。因此,当我们调查小组到了C村村委会,告知我们的调查计划,村支书表示支持,但他表示:

“瑶族屯寨都在山里,离我们行政村比较远。我们的罗文书是那边人,我在那边没有他管用。他今天没有来,我叫他明天领你们进去。没有他的引荐,你们是很难进行调查的,所以,你们今天就不用进去

了。”(访谈资料8:BCL01,男,50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5月5日,地点:C村村委会议室。)

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也能时常感知到C村山区瑶族村民对族际交往的淡漠。例如,在我们调查期间,有一个开小酒厂的小老板也骑着摩托车一路推销他的白酒。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不仅绑着一桶白酒,还坐着一位须发斑白、瘦骨嶙峋的老人。老人在摩托车后座上受尽颠簸。罗文书说:

“那个老人是酒厂老板的父亲。他父亲原先担任C村的村干部二十几年,在C村的各个族群中都很威望。他们是壮族人,没有他父亲出面,在这附近的村屯中没有多少人会理他。因此,为了推销酒,他才把他父亲也带出来。”(访谈资料9:BCL02,男,36岁,高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5月6日,地点:C村小店门口。)

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C村山区瑶族族内交往密切、族际交往相对冷漠已逐渐成为了一种地方性共识,山外其他族群的农民对山区瑶族的一般印象是:

“瑶族很多是住在山里面的,离这里比较远。他们是不怎么愿意和其他人交往的。我们很少和他们打交道。在集市上偶尔碰到,不怎么和别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只能同族结婚,没有其他民族的亲戚。”(访谈资料10:SFH01,男,48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年4月30日,地点:S村其家大厅中。)

总之,山区的交通不便、族内婚等因素导致C村山区瑶族农民与其他族群族际交往相对缺失。制度性族际关联(tie)的缺失使得C村山区瑶族农民工的“乡土社会网络”呈现封闭性、族内构成同质性高和以族内“强关系”为主等特征。山区瑶族农民工的“乡土社会网络”特征对他们的非农初职获得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

田野调查的资料发现,C村山区瑶族第一代农民工的非农初职都是在林场从事伐木行业。山区瑶族农民之所以能够获得、甚至垄断这一份非农职业,是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乡土社会网络”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有林场改革使得砍伐、运输林木等劳务外包。居住于山区的C村瑶族就成为最初承接这些劳务外包的主要族群。在长期劳务外包过程中,林场的外包劳务逐渐固定由几个总包工头承接。那些总包工头都是瑶族,因此,他们也主要是在同族近亲的瑶族族群中找寻次级包工头。山区瑶族族际交往的普遍缺失使得次级包工头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同族成员构成,瑶族的次级包工头也只会是在附近的瑶族屯寨中招募散工。因此,随着林场劳

务外包承接的制度化,外包劳务机会固定由几个瑶族包工头控制,林场劳务外包为瑶族族群所垄断。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林场普通散工的每天工资为四五元,后来工资转变为计件的形式,即按砍伐的立方数计费。近期林场外包劳务的费用为 35 元/立方。散工的平均月收入大约为 1 000~1 200 元,而次级包工头则可以从外包劳务中提成,月收入则可达 2 500 元以上。次级包工头较高的月收入使之成为许多瑶族农民的理想职业,但大部分人是普通的伐木工。林场伐木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而且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没法干,只能断断续续地参与林场外包的劳务活动,一年只能干六七个月的活。但由于所有的林场外包劳务都为瑶族成员垄断,凭着族群身份,只要他们想做,随时都可以重新再回来。

林场外包劳务虽然是很繁重的体力活,很辛苦且容易受伤,但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瑶族农民提供了一种较为稳定、收入相对较高的非农就业途径,因此,在那个时代,为许多其他族群的农民羡慕。但是,其他族群农民仅能羡慕,却没有办法获得这份工作。在访谈中,壮族的 SFH01 就说:

“那个时候,山里面的瑶族并不穷,他们可以去帮林场干活,能赚很多钱的。我们在附近就没有这么稳定的活可以干的。我们只能去南丹等地方的矿场干活,工资不高,又危险,就像脚底下踩着一个炸弹一样。”(访谈资料 11: SFH01,男,48 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4 月 30 日,地点:S 村其家大厅中。)

其他族群的农民之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这份工作的原因在于,在林场劳务外包制度化过程中,瑶族的工头实现了对这些外包劳务的垄断。瑶族是一个社会网络较为封闭的族群,因此,在劳务逐级分包的过程中,总包工头招聘的次级包工头都是瑶族,而各次级包工头在招募散工时,他们主要招募的也是瑶族农民而不考虑其他族群的农民。因此,在林场劳务外包制度化的过程中,由于族群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山区瑶族农民也实现了对林场外包劳务这一非农就业机会的垄断。

上述分析表明,山区瑶族农民工的“乡土社会网络”呈现封闭性、民族构成同质性高和以族内“强关系”为主等特征。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社会网络的上述特征使得族群内部某些成员掌握的非农就业机会排他性地在族群内部成员间分享,从而使山区瑶族农民非农初职呈现明显的聚集形态。

2. “新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次职流动

族群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和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抱团”现象既不利于族群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建构跨族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使族群成

员个体中心网络中职业构成异质性较低。^[14]这导致他们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缺乏获取就业信息和人情、影响力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络渠道,使族群成员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此,我们从山区瑶族农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求职历程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农民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蔚然成风。但在所访谈的山区瑶族农民中,最早外出搜寻林场劳务以外的非农职业就业机会大约为 1998 年。那位受访村民 BCL08 说:

“那时我在 N 市高峰林场伐木时,在一个小酒店里吃饭,听到旁边一桌人说到广东打工能赚很多钱。林场的活又累、又容易受伤,工资也不高,因此,我打算也去广东打工。”(访谈资料 12: BCL08,男,43 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15,地点:C 村小店门口。)

这比山外其他族群,他们外出寻找其他非农职业的经历晚了近二十年。其原因有以下两个:(1)社会网络是就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3](P73~80)}但从宏观社会关系网络的民族构成状况来看,社会网络的构成主体是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和壮族成员构成的,因此,山区瑶族成员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导致他们断开了与主体社会网络之间的链接,也就断开了就业信息的主体传播渠道;(2)从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的职业构成来看,族群成员非农职业的高度同质性导致以下两个不利后果:首先,职业高度同质性导致族群成员从个体社会网络中获取的都是重复的冗余就业信息;其次,社会网络的封闭导致同族成员过度聚集在林场伐木行业中,这使得山区瑶族族群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也不能建构跨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他们在向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缺乏获取人情、影响力、社会支持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络渠道。

社会网络渠道的缺失使山区瑶族农民的就业信息较为闭塞,使他们对其他非农就业信息反应较迟缓。因此,临近 21 世纪,他们中才有人打算外出打工。同理,社会网络渠道的缺乏使他们的人情、影响力等社会资源较为匮乏,导致他们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非常不顺利。在访谈中,很多人讲述他们初次外出搜寻工作的经历。其经历一般都遵从这样一个模式:

“在 2002 年左右,我们附近各寨有人也开始结伴外出打工。大部分人是去广东打工的。但是,广东那么大,我们没有确定的目的地,身上带的钱很少,只有 400 元,我们很着急想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熟人介绍,只能在街上游荡。看到有工厂贴出招工告示,我们就去应聘。大部分招聘的工

作工资都很低,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元。犹豫了几天,钱花光了,我们只能随便找份工作谋生。”(访谈资料 13: BCL08,男,43 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5 月 6 日,地点:C 村小店门口。)

可见,在外出打工过程中,信息、人情、影响力等社会资源的匮乏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哪些厂的工资、待遇更好,更没有人帮他们介绍工作。因此,很多山区瑶族农民在初次外出务工过程中,只能在公开贴出招聘告示的企业中找一份工作。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嵌入于社会网络中,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传播、获取、了解就业信息、获得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农民工所提供的主要是普通体力劳动,工作是可替代的,工作给谁做都一样,谁先知道、谁有关系,谁就更有可能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优质的非农就业机会往往早已为那些“有关系者”获得,而不好的就业岗位则被社会网络淘汰,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因此,正式招聘公布的就业信息往往是被社会网络淘汰的劣质信息,通过公开招聘所找的工作肯定就不尽如人意。因此,在访谈中,村民 BCL08 表示: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我和一个同伴在塑胶厂工作,其他几个人在皮具厂或五金厂工作。工资很低,前三个月为试用期,工资只有 400 元/月。期满后,工资涨到 600 元/月。除了工资低,工作环境也很差。塑胶在制作过程中有一种很难闻的恶臭,据说是有毒的。工厂安装了一个排气扇,也发给我们人手一个口罩,但是,那种气体太臭了。我忍了几个月,工资又低,又难以忍受那种味道,所以,我就辞掉了那份工作。回家后一检查,发现肺部还有些问题。其他几个人的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访谈资料 14: BCL08,男,43 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5 月 6 日,地点:C 村小店门口。)

上述分析表明,族群初级群体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族群成员非农职业的高度同质性和族群成员跨民族社会关系的缺失使他们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缺乏了获取信息、人情、影响力、社会支持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络渠道。信息、人情、影响力等社会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在获取、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过程中,茫然无绪、历经周折,最终纷纷铩羽而归。

另外,山区瑶族农民族群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导致他们在族际交往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使得他们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容易产生族群的过度“抱团”,从而很难融入地方性社会网络,因此,不利于族群成员流动过

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也就不利于好工作的获得。这一点我们从下述案例中就可以发现:

某男,今年 34 岁,2002 年开始外出务工,到过江门、深圳、珠海等地方打工。在打工过程中,一般是找同民族的老乡玩,偶尔会跟同一工厂同事玩,结交一些外地朋友,但是,感觉和他们交不上心,虽然在打工的时候留了电话,但是,分开后就没有联系过。(访谈资料 15: BCL10,男,34 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5 月 6 日,地点:C 村小店门口。)

某男,今年 26 岁,在南宁西乡塘的一个腻子粉厂打工。在厂里一般和老乡一起玩,但有空的时候他一般是找在朝阳广场工作的表哥一起玩,很少交其他朋友。(访谈资料 16: BCL13,男,26 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2009 年 5 月 6 日,地点:C 村小店门口。)

可见,由于地理、婚姻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山区瑶族农民“初级群体”社会网络更为封闭。这导致他们在族际交往过程中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以及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也使得他们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容易产生族群的过度聚集现象,不利于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也就对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山区瑶族的案例表明,族群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成员个体“原初社会网络”的同质性使同族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容易过度“抱团”。这使得族群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难以建构多元的社会关系,也难以融入打工目的地的地方性社会网络以建构“新社会网络”。这也就导致他们在非农转职过程中相对缺失了社会网络中的信息、社会支持和人情等社会资源的支持,使他们在非农职业领域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结果与讨论

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贫困问题是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那么,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受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山区少数民族这一弱势群体对市场机会的利用状况如何呢?本文以广西南部丘陵地区的 S 村壮族和 C 村山区瑶族为案例,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社会网络是导致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市场化、社会网络与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贫困。已有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禀赋、教育状况、贫

困文化的再生产等因素都是导致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相对贫困加剧的重要因素。^{[15][16]} 社会网络虽然也是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市场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以往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市场机会获得的积极影响,却相对忽略了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负功能的研究。^{[17][18]} 而本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会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社会网络是导致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相对贫困加剧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拓展了“市场化与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这一议题的研究,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社会网络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潜藏着诸多负功能。

第二,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社会网络之所以会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在于,山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族际交往的缺失,族际交往的缺失使得族群成员对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又导致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个体社会网络的民族构成单一、职业构成同质性过高和族群成员在流动过程中难以融入地方性社会网络。但我们需要拓展的几个问题是:(1)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都会形成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2)除“山区”这一地理因素外,宗教、生活方式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3)族群身份认同“内卷化”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产生影响,并且有可能不利于他们的非农职业流动。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山区”这一地理因素有可能会对山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内卷化”。

其二,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使得山区少数民族的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封闭,族群成员“原初社会网络”呈现民族构成单一、职业构成同质性高、以强关系为主等基本特征。

其三,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原初社会网络”的上述特征使他们难以融入流动目的地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新社会网络”难以建构。

其四,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原初社会网络”和“新社会网络”的上述特点使他们在非农转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信息、社会支持和人情等社会资源,从而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昉. 集成劳动力流动的研究[A]. 蔡昉,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

劳动力流动[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Portes, Alejandro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8.

[3][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 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美]林南,著,张磊,译. 社会资本——关于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李培林,赵延东. 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6]赵延东,王奋宇.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A]. 蔡昉,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熊瑞梅. 性别、个人网络与社会资本[A]. 边燕杰,涂肇庆,苏耀吕. 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C].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 2001.

[8]桂勇,张广利. 求职网络的性别差异:以失业群体为例——兼论社会资本的中西差异[J]. 南京社会科学, 2003, (6).

[9]周玉. 性别、社会网络资源与地位获得——以干部群体为对象[J]. 社会, 2006, (1).

[10]黎明泽. 浅论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以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4).

[11]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苟天来,左停. 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J]. 社会, 2009, (1).

[13]申端锋. 农民行动单位视域中的小亲族——以鲁西南 S 村为表述对象的个案呈现与理论阐释[J]. 江海学刊, 2007, (4).

[14]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4).

[15]李晓明.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5, (9).

[16]郭志仪,祝伟.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5).

[17]张文宏.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8]张文宏,索博. 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J]. 社会, 2007, (2).

返修日期 2013-12-1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郭云涛(1977~),江西吉安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广西南宁,邮编:530006。